



核心阅读

『百年未有之大历史视野中的』

□ 杜庆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努力适应和应对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历史大变局”的思想内涵

清人赵翼说:“(从春秋到)战国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李鸿章在1865年致友人的信中,也提出了著名的“千古变局”命题,认为他当时所处的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者路齐一曾定义说:“大变革(大变局)指一个国家(社会)的大发展,即一个国家(社会)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诸如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出现大发展和突破性进展,同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而不是指某项事业或个别社会领域的大发展。这样一种全面大发展的历史过程,往往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我们把它称作‘大变革’(大变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更高级的文明社会。比如,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大变局。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大变局往往还包括国际力量的对比,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

“历史大变局”的发展演进

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大变局”发端于公元前221年左右,代表性事件是秦统一六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农业上进入铁犁牛耕时代,在经济上瓦解井田制,在政治上分

正确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努力适应和应对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封制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取代,在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思想的统一,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大变局的结局是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而大一统带给中国的是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历史大变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代表性事件是罗马帝国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环地中海的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统一大国,经济空前繁荣,疆域幅员辽阔,政治高度稳定,宗教文化发达,这与之后西欧社会近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说,秦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的重大发展和成熟时期。

中国的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洋务思潮的“变局论”,结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族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从而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历史大变局”可追溯至17世纪,代表性事件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直至20世纪中叶雅尔塔体系确立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这一时期时间较长,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在各个领域完成了对亚非拉国家的超越,形成了延续至今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性格局。

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传统国际格局和综合实力已经发生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是个不确切的数字,不一定指一百年,也可能更长,也可能更短,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时间比较长。一战结束至今已101年,一战之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确立了大国瓜分小国的国际格局。二战结束至今已74年,二战之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确立了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力量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应该说,国际格局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表现。

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正在持续改写。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在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从联合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成立,再到形形色色的国际协议、制度、议事决策规则的制定,一并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总体上维持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但现行国际秩序也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今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国际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政治制度孰优孰劣?等问题,都在挑战着我们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认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作为担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判断和对自身发展的正确认识。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担当,要尽早把我们带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对迈向强国进程中现面对

的复杂局势和可能经历的困难强调得比较多。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不会对当前局势有这种判断。因此,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要放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共产党人所持的政治担当的背景下考虑。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

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不急不躁,冷静理智;默默积攒优势,牢牢掌握主动。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做到行稳致远,既是工作总基调、科学方法论,也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国家面貌与国民气质。应该说,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稳步发展,就是得益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只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心思定,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大变局时代。

坚持底线思维,补齐发展短板,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底线思维,就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掌握主动权。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处理错综复杂问题的理性态度,更是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方法。当前,补齐发展短板就是要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引领,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要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让人民群众活得更尊严、更加幸福。要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只有补齐短板、厚积薄发,才能在大变局时代有所作为。

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发展空间,在谋取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回望40年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前,面对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40年前。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大战略的实施,坚持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经济、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要继续深化改革,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破除影响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只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在大变局时代继续开拓发展新空间,进而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 邓 莉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学风。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我们在看待学用结合问题时,往往侧重于对学习主体即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不可否认,党员干部自身的态度在学用结合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解决学用结合问题,仅从学习主体的角度出发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学用结合不是简单的怎么学、如何用的问题,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受到诸种客观因素影响与制约的复杂过程。要真正解决学用结合问题,就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角。

解决“真学”的问题

所谓“真学”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学习党的理论是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水平、提升工作能力、增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我们的党员干部都必须学习党的理论。但是,将理论学习视为纯粹的形式和任务的人有之,究其根本,是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对学习党的理论的必要性没有正确的认识。学不是真学,自然无所谓学用结合。要树立“真学”的态度,关键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正确理解党的理论与当代中国所处时代、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我们从事的实际工作的深刻内在联系。同时还要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与时俱进是党的理论的根本特质,从而持之以恒地坚持学习党的理论。

解决“真理论”的问题

所谓“真理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理论“管用”的问题。理论是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系统化的成果,一种理论只有对现实有充分的解释力才能“管用”,才会被人们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从而由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上接1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果已得到显著提升。如实施稳投资举措,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升;深入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在全国推开,企业开办时间大幅压缩,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三分之一以上;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推动降低用电、用网和物流等成本;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各地探索推广一批有特色的改革举措,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等等。

王东京强调,这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大功告成,更不能由此产生歇气松懈的思想。应该看到,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某些产业或行业甚至还比较严重,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战术上继续打开灭战,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长远目标是建立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体制机制,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所以要通过改革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把改进当前供给质量与建立合理的供给体系结合起来,用市场机制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由此将近期任务与长远目标相衔接。

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

用总体性观点看学用结合问题

核心阅读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学风。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受到诸种客观因素影响与制约的复杂过程。要解决学用结合问题,仅从学习主体的角度出发远远不够,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角。

构建“善”的社会环境

构建“善”的社会环境是指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党的理论的学用结合最终体现在党员干部的实践中,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用结合的关键在“结合”、在“应用”,是否能做到“结合”与“应用”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党员干部自身是否有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只要对党的理论有“真学”的态度,就能通过在实践中长期自觉的训练来提升这种能力。更值得重视的是第二个因素,即整个制度条件与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按照科学的理论行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思想观念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每个个体的思想与行为被整个社会环境所影响与塑造。思想问题的解决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一体两面,只有解决实际问题,以制度约束为基础,塑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真学才能最终体现为真用,实事求是、真学真用才能蔚然成风。

以“美”的方式传播理论

所谓以“美”的方式传播理论就是要解决理论阐释与传播方式的“友好性”和“有效性”问题。在思想价值多元化、传播媒介多样化的今天,要使党的理论保持吸引力,传播方式就显得尤其重要。理论源于现实,但它是人们运用一系列的概念构建出的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其表达方式因而区别于日常表达方式。因此,党的理论在阐释与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话语,即友好的方式来阐释理论,力图在这一过程中使理论本身不失去其原汁原味,即得到有效的传达。毋庸讳言,以往在党的理论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手段与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逐渐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理论的内容建设与传播方式的改进与创新齐头并进,是解决学用结合问题的重要基础。



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东京提出,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主要是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 forms,要用市场机制去产能、去库存,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要素流动,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逐步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王东京表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重在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通过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降低制度性成本,激发企业创造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体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促进消费业态创新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以市场需求引导投资向能创造最优产出的领域

流动。

王东京认为,提升产业链水平,核心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个精辟的比喻:“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一方面,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对于增强国企创新动力,关键是激励或约束企业高管层。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关键是建立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另一方面,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但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关键是要通过中央顶层设计,并利用中央的权威加快“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依靠创新提质增效。

王东京指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正监管是公平竞争的保障。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须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若要素市场被固化,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国家层面重在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 and 标准,地方政府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公正监管上。用公正监管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

专家视点